

《动态环境中的创业活动：中美对比》 评述

□ Wesley Wu-Yi Koo (吴一)

摘要：近30年来，在创业领域涌现了两类不同的文献：动态环境中的创业和制度变迁中的创业。这两类文献提供了两种相异但又相关的理论框架。Wu等（2020）指出，“动态环境中的创业”文献多基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经验，更侧重研究创业者本身，比如创业者的自身认知、创业者团队在寻求商机时依循的惯例，以及创业者如何在效率和弹性中寻得平衡（efficiency-flexibility balance）。另一类文献，即“制度变迁中的创业”文献，则更侧重制度环境，比如不同制度环境下创业者如何适应变化。本评述赞同Wu、Eesley与Eisenhardt的基本论点，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几点延伸。第一，研究中国创业，制度环境固然重要，创业者个人因素同样重要。中国的创业研究应勇于跳出“制度变迁”的框架，看是否能在“动态环境”的框架下，形成理论创新。比如，中国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诸多与“效率-弹性平衡”相关的案例（例如，腾讯的内部“赛马”竞争策略）。这些基于创业者、创业团队本身的案例为“动态环境”框架下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土壤。第二，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新经济和数字化企业。这类企业不但在适应制度环境发展，也在一定层面上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这类企业亦受到鲜明的企业文化和创业者风格影响。研究这类企业可以改变我们对制度变迁和动态环境研究的认知。

关键词：创业；动态环境；制度变革；数字经济；数字制度

中国和美国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和创业成长的两大原型，Wu、Eesley和Eisenhardt的这篇回顾文献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进行了对比。同时，文献也对比了两类有着独特来源的创业研究文献，它们分别是：①植根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动态环境创业研究；②植根于制度理论的制度变革中的创业研究。前者包含主要在美国情境下进行的研究，后者则包含不少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的研究。作者们敏锐地指出，两类文献长期以来关注不同分析层次、不同管理决策和不同的核心概念（见表1）。长期下来这些不同点形成了两种研究传统，它们的影响力渐增却少有交集。因此，这篇

文献不仅对比了中美两国情境下的研究，同时也尝试去融合这两类研究传统。

表 1 分析层次、关键管理决策和
两类文献的核心概念

	分析层次	管理决策	核心概念
动态环境	个人 团队 组织间	灵活性 VS 效率	速度 复杂性 模糊性 不可预测性
制度变革	环境 组织（适应环境的）	适应变革 中的制度	制度障碍 制度中介 制度不一致性

如表 1 所示，美国相关的研究聚焦于创业者如何管理争取捕捉机会时效率与灵活性之间的张力，而机会通常由技术变革产生（Eisenhardt et al., 2010）。这类文献一般采用微观认知的视角。相反，中国相关的研究聚焦于创业者如何适应变革中的制度（规范性、认知性和规则性）（Scott, 2008；Tolbert et al., 2011）。这类文献一般更具宏观导向。关于两类文献各自的创业策略，这篇回顾文献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各自的创业战略中美两国的学者和创业者可以相互学习。在接下来的部分中，笔者将概述这篇文章可以拓展的一些地方。这些拓展的目的是围绕这篇回顾文献产生更多的对话，并激发新的观点。

一、分流的起源和对未来 研究的启示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可供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中美各自相关的研究之间的差异最

初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有关美国创业的研究聚焦于管理认知，而有关中国创业的研究却更多地聚焦于制度变革？毕竟在世界范围内，管理认知都有可能是创业的关键要素，这也是这篇回顾文献承认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相关创业文献却大多数是宏观导向的？诚如作者所述，令人惊讶的是，基于认知的创业策略“很少在西方以外的情境下被检验”。

作为一个整体领域可能可以在研讨会和论坛上讨论这个困惑，而笔者个人可以提出几点猜想：第一，研究新兴市场中创业的文献会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而以西方为中心的论文催生了其他以西方为中心的论文。第二，遵循这一传统的学者主要来自西方，因此他们可能一般不太习惯于在亚洲/中国情境下进行研究。第三，正如作者所提出的，考虑到中国的制度环境一直在快速变革，中国很可能已被视作最适合研究制度变革的情境。然而，这种认为“中国是制度变革的试验田”的看法，有可能会降低创业领域中研究中国情境下管理认知的重要性。更糟糕的是，不经意间，这种思维定势很有可能让使用中国情境来研究微观理论（例如，管理认知）在研究者眼中变得“不正当”。一些研究者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①没有必要去研究中国情境下的微观认知策略，因为很多类似的研究已经在美国的情境下开展过了；②制度变革是中国情境的典型特征，因此，在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应该更强调此类理论。

笔者希望关于这篇回顾文献做出以下拓展：中国创业学者可以通过考察管理决策制定、采取更偏微观的方法，去研究管理层决策和组织行为习惯。尽管学者们在开展中国的相关研究

时，可能会面临纳入制度变革和其他宏观理论的压力，但是学者们应该勇于脱离这类框架。

二、在中国平衡效率与灵活性

这篇回顾文献暗示，因为美国的初创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平衡灵活性与效率”，中国的创业者可以向美国的初创企业学习。但是，就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创业者是否在平衡这两个要素时更为低效尚存争议。比如说，Ozcan 和 Eisenhardt（2009）在西方环境下探索出一类策略：管理团队可以与两个先前未有联系的他人形成中介三角关系，通过这类关系的建立提高企业灵活度和效率。可是，这种较为微观的理论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创业者得出。因为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中介连带更加普遍、多维（Li & Piezunka, 2020），通过研究中国创业环境得出的结论甚至可以比源自西方情境的结论更为丰富。也就是说，并非只有美国创业者可以更好地平衡灵活性和效率；而是这个主题的顶级学者们一直采用了西方为中心的视角，而在中国情境下少有深刻见解被揭示出来。

所以，在平衡效率和灵活性方面，中国应该被更多的人视为微观理论构建的土壤。实际上，考虑到商业环境的快速变化（既有技术上的又有制度上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创业者对效率和灵活性有更高的需求。这在很多例子中有所反映。例如，对于同一个项目，腾讯通常会让几个团队彼此竞争，但是最后只有一个团队的最终产品会被通过，而其他的就会被舍弃；微信就是这样被开发出来的（吴姬坤，2016）。有人会说这种创新的方法是对资源的浪费，然

而从某个角度出发，这种内部竞争不仅让团队创新变得更加高效，还让企业在平台层面上更灵活地探索机会（因为具备可从不同的产品方案中选择的能力）。腾讯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这些例子彰显了中国独特的创业现象如何有助于微观层面的理论构建。

三、中国与新经济

如何将这篇综述文章中概述的知识点应用于研究新经济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笔者所说的新经济，泛指围绕数字平台开展的，或者是那些高度依赖最新技术进展（通常是数字性质的）进行的经济交往和市场交易。尽管这篇论文暗示，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处于“技术创业的前沿”，但在数字领域，上述论点可能已经反转。抛开隐私、伦理而言，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人脸识别和商用机器人等领域，中国创业者和初创企业可以说近年来比美国同行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换句话说，就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技术环境而言，中国创业者可能会提供比美国创业者更多的知识。

作者还指出，为了在制度变革中抓住机遇，中国创业者迫切需要采取一种将个人连带或政治连带与市场连带相结合的混合策略。个人连带（关系的形式）对于保障财务资源和政府控制的资源（例如，许可和市场准入）尤为重要（Li & Zhang, 2007）。然而，与传统的线下经济相比，个人连带对于在新经济中的创业并不那么重要，这也正好迎合作者关于降低制度壁垒的论点。在诸如建立科技园和市场化改革等传统制度改革之中，创业者需要与地方官员等关键人物建

立关系连带。然而，随着经济的数字化，进入壁垒和增长壁垒又降低了一个数量级。市场准入和许可等关键资源不再紧紧掌握在某些个人或政府机构手中。例如，在电子商务中，与当地政府官员或官僚的个人连带对草根创业者（例如，网店店主）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会积极避免与官员产生连带关系（Liu & Weingast, 2018）。

总之，学界关于制度变革的认知需要在新经济中进行重新理解。在线上市场中，数字平台承担了监管者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平台是新经济的制度创业者（Boudreau & Hagiu, 2009）。在平台上，以新的算法、新的界面和新的基础架构形式进行的制度变革非常频繁。这种迅速的制度变革与传统的制度变革（例如，市场改革）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变革速度尤为迅速（以天、小时、分钟甚至秒为单位）。新经济的这一特征带来了两个有趣的研究路径。首先，在中国背景下进行的制度研究可能变得更具适用性。就目前的理解而言，传统形式的制度变革在中国等更加集权的经济体中更加频繁，在美国和其他权力分散的经济体中可能不太适用。但是，数字化形式的快速制度变革在两国的科技领域都是极为普遍的。因此，鉴于其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和巨大的数据潜力，中国可能会为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制度提供富饶的土壤。其次，中国的新经济将有助于学者们将本文所讨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献流派——动态环境中的创业和制度变革中的创业——融汇起来。例如，平台上的算法变化要求创业者每月、每周、每天甚至每秒都要与数字制度环境保持一致和再调适。这就是学者所描述

的典型“高速市场”（Eisenhardt & Martin, 2000; Eisenhardt & Sull, 2001）。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业者需要提高信息效率，以获取理解不断变化的数字制度所必需的信息；为了立即适应新的数字制度，他们必须具备认知上的灵活性和即刻改变自身策略、行为的动态能力（Koo & Eesley, 2020）。

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AI/ML）在管理决策方面的应用会非常丰富。在管理决策中管理者会根据机器产生的建议做出决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情境下，机器会代表管理者做出决策。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源于中国的研究可能会影响未来管理、创业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认知。

综上所述，Wu 等（2020）给两种不同的文献流派（动态环境中的创业和制度变革）如何在两种原型经济体系（中国和美国）情景下进行研究带来了丰富的洞见，为学者和企业家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为了在动态环境中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平衡效率和灵活性非常重要。同时，创业者需要关注进入壁垒、成长壁垒和退出壁垒的变化。在这篇评述中，笔者概述了三种拓展，希望能为思考未来的创业研究提供一些养料。具体来说，中国有潜力成为管理认知和决策等微观理论的温床。此外，源于中国的制度变革研究可能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具适用性，尤其是在目前数字制度光速变化、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

接受编辑：Haiyang Li

翻译：罗银燕、李晓林

校 对：黄乐维

收稿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5 月 8 日

作者简介：

Wesley W. Koo 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助理教授，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数字化、平台、数字制度、社会发展。他着重于研究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和企业家认知，致力于构建关于“线下界面”的理论——线下环境如何影响组织和个人的线上行为和策略，以及线上环境如何影响其线下行为和策略。

参考文献

[1] 吴娅坤：《马化腾分享腾讯三道坎：微博崛起曾是最大危机》，《观察家》，2016 年第 10 期。

[2] Boudreau, K. J., & Hagiu, A. 2009. *Platform rules: Multi-sided platforms as regulators*. In Gawer A. (ed). *Platforms, Markets and Innovation*. Edward Elgar: London, UK: 163-191.

[3] Eisenhardt, K. M., Furr, N. R., & Bingham, C. B. 2010. CROSSROADS—Microfoundations of performance: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Organization Science*, 21: 1263-1273.

[4] Eisenhardt, K. M., Martin, J. A. 2000.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1105-1121.

[5] Eisenhardt, K. M., Sull, D. N. 2001. Strategy as simple rul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9: 106-116, 176.

[6] Koo, W. W., & Eesley, C. E. 2020. *Platform Governance and the Rural-Urban Divide: Sellers' Responses to Design Change*. Working Paper.

[7] Li, H., & Zhang, Y. 2007.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791-804.

[8] Li, J. B., & Piezunka, H. 2020. The uniplex third: Enabling single-domain role transitions in multiplex relation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5: 314 - 358.

[9] Liu, L., & Weingast, B. R. 2018. Taobao, feder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law, Chinese style. *Minnesota Law Review*, 102: 1563-1590.

[10] Ozcan, P., & Eisenhardt, K. M. 2009. Origin of alliance portfolios: Entrepreneurs, network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246-279.

[11] Scott, W. R.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2] Tolbert, P. S., David, R. J., & Sine, W. D. 2011. Studying choice and change: The intersection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2: 1332-1344.